

福特訪匪的分析批判(下)

丁 匡 華

在所謂美匪「關係正常化」問題上，鄧小平曾謂：「……自從上海公報發表以來，總的來說，兩國人民之間的來往和友誼有了增進，兩國關係有所改善。……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符合『中』（匪）美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我們相信，只要認真遵守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這一願望終將實現（十二月一日鄧小平設宴款待福特的祝酒詞）。又稱：『『中』（匪）美兩國社會制度不同，我們雙方的意識形態不同，在我們之間自然存在着原則分歧。……雙方認為：上海公報是有歷史意義的文件，是『中』（匪）美關係的基礎。事實表明，它今天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十二月四日鄧小平在福特告別宴會上的祝酒詞）。福特則稱：『在上海公報中，我們兩國承認『中』（匪）美兩國的社會制度和對外關係有着本質上的區別。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同意，關係正常化符合我們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會有助於建立一個更加安定的國際秩序。……我借此機會重申，我保證致力於那些最初步驟中所確定的目標和原則，特別是兩國關係的正常化』（十二月一日福特在鄧小平的宴會上的祝酒詞

）。又稱：「我同毛『主席』和鄧副總理進行的範圍廣泛的會談，是友好、坦率、有實質內容和建設性的。……我在我們的會談中重申，美國保證致力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完成美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匪）的關係正常化」（十二月四日福特在告別宴會上的祝酒詞）。可見美匪雙方對有關所謂「關係正常化」問題，完全是以所謂「上海公報」為其主要環節。但事實上，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七日尼克森與周恩來在上海發表的美匪「聯合公報」，對於所謂「台灣問題」祇是各說各話的對白，毫無任何肯定的承諾。在該「公報」中，美國不會如共匪所說的那樣，承認共匪偽政權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不會承認我中華民族作為復興基地的台灣是共匪主權管轄下之所謂中國之一省；也不會承認所謂解放台灣是共匪之所謂中國的內政。美國在該「公報」中，只聲明其對「台灣海峽兩邊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立場不持異議。換言之，即美國對於中華民國政府及台灣一千六百萬中國人——實際還包括海外及大陸多數中國人之認為只有一個中華民國，而台灣是中華民國一部份的立場，對於共匪認為只有一個偽「中華

人民共和國』（匪），而台灣是偽「中華人民共和國』（匪）一部份的立場，一概都不做主觀是非的認定。其次，依「上海公報」、美國所關切的是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美國依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台灣建有若干軍事設施和武裝力量，美國在該「公報」中曾經承諾「它將隨着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而逐步減少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 and 軍事設施」，一切以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為準，「減少」與否及如何「逐步減少」，將由美國視其情勢而定。再次，美國亦不會同意所謂「台灣問題」是阻礙美匪「關係正常化」的關鍵的說法，在「上海公報」中，那只是共匪單方面的「立場」之「重申」，正因此，所以美國雖曾承諾依本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並最後全都撤出它在台灣的武裝力量 and 軍事設施，但不曾片言隻字涉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存廢及中美兩國外交關係的斷續問題。現在共匪自毛匪澤東以次均異口同聲以這樣一紙空洞不落邊際的「上海公報」視作處理美匪關係正常化問題的基礎，而福特總統及季辛吉竟亦隨而附和，真不知從何說起。

從根本上看，共匪自從一九七二年二月與美

國發生勾搭關係以來，其仇美反美政策並未改變，而且一直以美國為敵，美匪關係絕對沒有真正趨於正常化的可能。須知，共匪現仍以反對美蘇兩霸並與之鬥爭為其對外的基本政策路線，但共匪對蘇修的鬥爭，還是相對的，可以改變的，一旦蘇俄的當權派改變了對共匪的態度，放棄了大國沙文主義，共匪與蘇俄的關係便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改變。然而共匪「反美帝」的政策目標，則是永久性和絕對不可能改變的。因為這是共產主義世界的共同目標。事實上，今天共匪由於受到蘇俄大國沙文主義的各種威脅，雖然不能不大張旗鼓來進行反俄鬥爭，但是，共匪並未因為反俄而和緩其「反美帝」的鬥爭，其在國際間的統戰，是實行兩面反，是將「蘇修」與「美帝」連在一起，反兩大超級強國，反兩個強大霸權。所以，我們可以說，共匪「反美帝」的政策路線，那才是美匪「關係正常化」的真正障礙。其次，美國應該了解，今天共匪拉美國來反俄與美國拉匪以制俄，其目的與作用也完全不同。美國拉匪以制俄，其目的與作用在於分化共黨陣營，抑制蘇俄的擴張，尋求與蘇俄達成真正的「和解」，以確保這個世界的脆弱均勢。再明白的說，美國聯匪以制俄的最終目的，在尋求和解與妥協，避免衝突和戰爭。但是，共匪聯美的目的與作用，乃在運用美國的勢力和關係，以抵抗蘇俄對匪的威脅，並進而助長美俄之間的矛盾衝突，使美俄打一場核子戰爭，促成「兩霸」兩敗俱傷，以坐收漁人之利。果真如此，那實其美國之愚不可及，結果、徒足有損害於中華民國，同時也將損及美國的

國際地位和福特自己的政治前途，噬臍莫及。

二、「聯合公報」的關如

這次福特訪匪，於其飛離北平之前，未與鄧小平發表「聯合公報」，殊出人意外。中央社華盛頓十二月四日專電稱：「中央社記者根據季辛吉於四日在北平的記者招待會實況錄音顯示，季辛吉在答覆有關不發表「公報」問題時表示：「……我們不願花費時間準備這樣的「公報」。但最重要的是——因為對於基本原則——尤其是有關台灣方面——實在沒有多少可以為「上海公報」在這一方面所已表明者有所增添。試圖對這個特別問題找出一些細微差異，似乎不適當或值得的」。這是季辛吉對這次美匪會談未發表「聯合公報」的自我辯護。而且季辛吉在福特出發訪匪之前，即已聲明此行不會討論重大問題，因此無須發表「公報」，這種解釋實令人大惑不解。因為福特在決定訪匪之前，其本人曾一再強調此行的重要，既然如此，應該提出討論的問題必屬重大事項，在會談結束後，就不應不發表「公報」，這實是難以自圓其說的矛盾現象。

從事實上說，我們認為美匪雙方並不是不想發表「公報」，主要原因是有不能發表的「苦衷」。其間因素可以有兩種假定：首一假定是雙方對所有實質問題，根本無法取得協議，因此，即使準備發表「公報」，可能連措詞都無法下筆，唯其如此，不如「寧缺毋濫」，雙方同意不發表「公報」，藉此遮醜。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報」，一般人認為是國際文件中前所未見的形式，因為該「公報」所列舉的，除了雙方同意的問題

外，同時也列舉雙方不能同意的問題。此次的福特訪問，如果對一系列的實質問題有些產生協議，有些存有歧見，則大可仿照「上海公報」的形式，發表一次「公報」。此次決定不發表「公報」——證明無一問題雙方能夠達成協議，即使想援用前例，也不可能。另一假定是雙方達成了某種協議，但不能公開，因此決定不發表「公報」，這可能比較微妙，但仍不可加以全部抹殺，因為如果確有其事，則該一問題一定具有高度敏感性，譬如說對蘇俄「和解」政策的某種妥協，但又不欲使三角關係失衡；或者對所謂「台灣問題」的某種諒解等，都有可能。然而這不過祇是假定而已，究竟如何，當有待於事實證明。

其實，美匪雙方對於處理其重大問題上，各有其基本立場，決不會對方所左右，縱然有所遷就，亦必不致犧牲其本身利益為原則。就美國而言，美國自中南半島三國相繼赤化，及其自身威望日益墜落之際，必須以事實表現其增進亞洲盟友的友誼，尤其履行防衛條約義務以維護共同安全，如果遽爾承認共匪，勢必動搖中美現存關係乃至共同防衛條約，此一後果何等嚴重。目前美國多數民意尤其國會人士，明白表示其維護中美傳統友好關係的願望，最近過半數的二百八十八位眾議員聯署提案，敦促其政府「在進行減緩與中共緊張情勢之際，切勿作出危及盟友中華民國的行動」；廿九位參議員又聯名致函福特總統，重申此一立場，福特總統必須特予重視。其次美國近年大搞「三角關係」，意圖在於具有制衡蘇俄的謀略作用，如果過份接近共匪，即將失去制衡作

用，進而增加共匪的聲勢，對美國更爲不利。就共匪而言，共匪必然估量了華府有其不可讓步的限度，因而採取迂迴前進的戰略，鄧小平在宴請福特總統時說：「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符合雙方共同的願望，只要認真遵守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這一願望終將實現」，這是鄧匪企圖以自說自話的方式，表明美匪「關係正常化」已有進步，不僅是藉以混淆國際視聽，抑亦已爲雙方不發表「公報」預留下口實。

就事論事，美匪雙方互相利用的關係雖無改變，但互相可資利用的價值，已大不如前。蘇俄對美匪之勾搭似不如四年前之緊張與憂懼，因此美國冀望與匪接近以促成對蘇俄的「和解」，效果不大，而共匪對聯美制俄的信心也大爲削弱。在此種情況下，美匪關係已無法超越尼克森訪匪時所簽訂的「上海公報」範圍，因此，即使發表新的「聯合公報」，當然不會有什麼新的內容，既然沒有新的內容，不如以不發表爲宜，俾資掩飾，這亦可說是這次福特訪匪毫無所獲之又一事實證明。

三、「日本模式」的荒謬

在這次福特訪匪期中，特別值得我們重視和警惕的，厥爲合衆國際社北平四日電報導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於十二月四日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中所稱「美國將把日本給予中共外交承認，視美國將來可能承認中共的一個模式」。又據中央社華盛頓四日專電詳加報導稱：「一位記者問季辛吉：『你所說的正常化的含義如何？中共希望我們做什麼？在該台灣問題可正常化以前有何必要之舉？』」

季辛吉說「我認爲中共已表明他們所希望的一般模式是類似日本模式者，我想我們也已表明，這種過程之趨於成熟，以及某種情況之出現，都將需要時間」。季辛吉透露，福特總統與中共頭子會談時，曾經檢討台灣問題。據季辛吉說：「中共曾解釋他們對正常化的問題久已爲人所知的立場。美國方面也曾表明他對上海公報原則的承諾」。在答覆有關按所謂日本模式承認中共的最後一個問題時，季辛吉說：「我們必須待正常化在事實上呈現時決定。這日本模式是我們所瞭解的中共立場」。

從上項季辛吉在記者招待會上的透露，可見在這次美匪的高峯會談中，共匪業已向美國提出欲以「日本模式」圖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之正式建議，美國既未拒絕，但亦未作肯定，僅是表明：「這種過程之趨於成熟，以及某種情況之存在，都是將需要時間的」，作爲側面的答覆。我們揣測季辛吉所云「某種情況之存在」，當是指美國與中華民國現時尚有正式外交關係而言。此外，季辛吉所云對共匪給予「完全的外交承認」之外，又加上「日本模式」這一句話，可能是含有另一種「條件」的意味，那就是這種外交承認不能排除美國對中華民國的實質外交關係。也就是說，台灣的現狀將繼續保持。並且，爲達到這一目的，中美之間勢必有更妥協的安排，不但要便利兩國人民旅行貿易與其他往還，還要維持二十五年的台灣協防工作。其實，從任何方面來說，這一所謂「日本模式」，無論是共匪表示如此的希

望，或是美國有此意圖，都是不切實際的。

事隔兩週之後，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哈比於十二月十七日在衆議院外交委員會特別調查小組作證時指出：採取「日本模式」以達到「關係正常化」是中共要求的一種模式。美國目前還沒有達採取「日本模式」解決與北平「關係正常化」問題的階段，這是因爲美國與台北的關係，與日本截然不同，美國更深的介入中國事務，同時美國對中華民國有條約義務。

事實上，無論就中美兩國現有關係及美國所擁有的主觀條件而言，都與田中政府時代的日本有重大的不同。日本乃二次大戰的戰敗國，迄今在國防安全上受到別國的保護。日本與我中華民國之間，實質上只存在有經濟貿易的互利關係，主要乃因遭受「尼克森震撼」所致，美國今日則不然。就中美兩國關係而言，美國是中華民國的盟友，而中華民國也是美國的戰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抵抗日本侵略的戰鬥上，在轉戰和越戰期間的反共黨的戰鬥上，在整個亞洲的和平保衛上，中華民國都協助美國，爲美國解救不少的困難，鞏固在太平洋的地位，沒有中華民國屹立於亞洲的東北，捍衛着台灣海峽，不待越戰失敗，中南半島淪陷，整個遠東的局勢，就早已面目全非了。美國豈能忘懷這位戰友？又豈能打擊這位戰友？日本承認共匪僞政權以後，繼續與我中華民國保持「亞東關係協會」及「日華交流會」形式的民間關係，用以處理兩國以經濟貿易爲主的實質交往，並未產生太多的困擾與不便。試問：美國

若依「日本模式」與共匪建交，將如何維持其與我中華民國之間日益親密，且為雙方所必需的政治與軍事關係？

再就美國自身今日所擁有的條件而言，美國為今世第一大國，其與共匪自一九七一年以來所開始的接觸，被共匪用為抵制蘇俄威脅的主要條件。在以往四年所謂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美國所獲自共匪者少而又少，若全般加以評估，可謂百分之百為負數，而共匪所求於美國者多而又多，或已成為其生存與發展的唯一憑藉。大的形勢如此，美國有何理由，又有何必要對共匪作出有損於中華民國與其人民自由及權益的重大讓步？何況日本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又絕對不能與中美關係相提並論。日本在承認共匪前，與中華民國僅有外交關係，但美國對中華民國則在外交關係外，還負有條約義務。美國不反省其對匪政策在亞洲所造成的惡果，今若反其道而修言什麼「日本模式」，那是美國的絕對錯誤，也是美國外交的迷失，更是美國國際的自我貶落。季辛吉在記者招待會中雖曾表示，美國並沒有仿照「日本模式」承認共匪的「時間表」，但他對「日本模式」的認同，則溢乎言表，顯見美國對美匪「關係正常化」，最低限度已經確定原則，所考慮的僅是「時間」問題而已。猶憶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與周恩來在上海簽署「聯合公報」之後，立即授權季辛吉在上海招待記者聲明美國對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繼續信守保證。不期三年又十個月之後，福特結束訪匪前夕，又由季辛吉國務卿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美國將把日本給予共匪的外交承認，視

為將來可能承認共匪的一個模式，同樣出自季辛吉之口，但已今非昔比，面目全非，撫今追昔，不禁浩嘆之至。

尤有進者，即以福特、季辛吉乃其策士所親聆鄧小平的歡迎致辭而論，亦仍可分為兩個部份。後一部份直指蘇俄為「和平經驗得最起勁」的「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對蘇俄加以攻訐之外，即前一部份之所謂「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時代洪流更加高漲」；但「第三世界的興起和壯大，形成了一支不容忽視的在國際上起重大作用的力量」等說辭，又何嘗不是視美為「帝」，而竭盡威脅詭詐之能事？中南半島變局所造成的創痍未復，蘇俄對美疑忌的心理，已往美匪關係的發展而加重，如今正是檢討已經得失，重作今後部署的最適當時機，如何能冒天下大不韙，對共匪之勒索更作此全無必要的讓步？何況美國在各種關係、地位與條件上均非日本可比，使美國處理國際重大事務而仿效日本的「模式」，豈非蓄意對美國加以貶損和污辱？福特總統聆悉共匪此項圖以「日本模式」試探美國意向之後，不特未加拒絕，而且授權季辛吉招待記者予以宣露，此豈是一個大政治家應有的風範，吾人實不啻引為莫大遺憾。

四、美俄匪三角關係
這次福特訪，與匪進行勾搭，由於雙方在會

談中，並不僅是單純的美匪之間關係，而且觸及與蘇俄的「和解」與「反和解」問題在內，故而除美匪關係之外，還涉及美俄匪三角關係。

福特在十二月四日晚間設宴款待匪方頭目的告別詞，及鄧小平的答詞，都曾提到雙方也有「共同點」。他們所指的「共同點」，主要在國際問題，雙方討論了蘇俄的霸權擴張及美俄關係緩和，也涉及到歐洲的局勢。同日，季辛吉在北平「民族飯店」的記者招待會透露，他們與共匪的會談，「關於歐洲統一和歐洲合作以及歐洲同美國合作的概念是一樣的」。關於同日本的關係，「概念是相似的」。所謂「歐洲問題」，是針對蘇俄而言，共匪認為蘇俄在歐洲擴大霸權，將加重戰爭危機，北太平洋公約組織面臨威脅，美國也注意到蘇俄的擴張活動，所以能在這一方面，與共匪找到了「共同點」。事實發展雖然如此，但福特仍然堅守原則立場，對於與蘇俄的「和解」，並未因共匪之反對而有所改變。在訪匪返美之後，對於美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仍在繼續進行。季辛吉預定在近期內訪俄，與俄會布列茲涅夫進行該一問題之具體會談，以期有所突破。

實際上，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匪，美匪發表「上海公報」，決定美匪「關係正常化」政策，從三年來的美俄匪關係發展的事實證明，當年尼克森所假設的新外交政策，乃是完全錯誤。當年尼克森政策的第一個假設是：認為匪俄關係如此惡化，鬥爭如此尖銳，如果美國向共匪伸出友誼之手，將可使美匪之間關係改變，化敵為友，將共匪拉到美國的一邊，可使美國對蘇俄增加其談判地位，但三年以來事實證明，共匪因與美國之

勾搭而闖進聯合國，已大大增長共匪在國際間的聲勢，並未絲毫改變其「反美帝」的政策和行動，在國際間和世界各地更加積極的進行反美鬥爭。共匪曾坦承與美國勾搭，祇是其對美鬥爭策略之運用。當年美匪勾結之初，共匪在向內部發出「國際形勢宣傳提要」文件中指出：「毛『主席』（毛匪）革命外交路線的核心，是依靠人民堅決支持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建立最廣泛的反美國際統一路線，大力促進世界的發展，我們同意和尼克森相談，主要目的是為了發展同美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爭取機會，創造條件，把工作做到美國人民中間去，從思想上、輿論上幫助美國人民起來革命，推翻美國的反動統治。」一九七三年匪昆明軍區政治部根據匪總政治部所頒之匪「連隊形勢教育提綱」第三課「毛『主席』（毛匪）革命外交的偉大勝利」，對共匪勾搭美國陰謀更是暴露無遺。由上述情況，可見美國欲藉美匪勾搭改變對美政策，使之化敵為友的假設和妄想，業已完全落空。

尼克森當年的第二個假設，認為即使不能使共匪化敵為友，亦可以敵制敵。其實，這種想法，也犯了兩大錯誤。第一個錯誤是假使美國聯合共匪，可以助長匪俄的衝突，防止匪俄棄嫌修好。但是，事實告訴我們，匪俄關係的惡化，根本與美國對共匪的政策無關，共匪反不反俄，與美國聯不聯匪，其間並沒有什麼關聯。過去共匪反俄，美國並未聯匪，今後美國如果聯匪，也同樣不可能阻止匪俄關係的改變，事實如此，美國又何必爲了聯匪，要付出如許的代價。第二個錯誤

，是對於共匪制衡蘇俄的作用，估價過高，以爲美國聯匪，便可運用共匪的力量，有效阻遏蘇俄的擴張，但是，事實又告訴我們，共匪對於阻遏蘇俄的擴張，並沒有多大作用。不久前季辛吉在一次背景說明的記者會中，也坦白承認他過去對共匪制衡蘇俄的作用，估計過高，事實上，無論在東南亞、在中東和非洲，共匪對於制衡蘇俄的擴張，都未能發生作用。

福特面對當年尼克森的政策假設錯誤，自應適切及時加以糾正，否則美國將在國際上處處爲匪俄所制，對於美國未來命運，殊爲莫大打擊。

肆 中華民國的嚴正立場

這次福特總統訪匪，我中華民國政府一直表示反對，曾由我外交部兩次發表嚴正聲明，以示抗議。當美國政府於十一月十三日宣佈福特總統訪匪行程之日，我外交部即於同（十三日）日發表聲明：「此次美國福特總統前往中國大陸訪問，中華民國政府特重申此一貫反對之立場」。並提出忠告：「美國爲吾人之盟友，不應爲毛共所惑而做出任何損害中華民國及中國人民利益之事」。

迨福特總統結束匪區訪問，我外交部復於十二月五日發表嚴正聲明：「再度重申我政府堅決反對美國政府與毛共交往之嚴正立場」，並在「聲明」中指出：「自所謂上海公報發布以來，美國謀求與毛共妥協，非特未能進一步保障亞洲國家之安全，反而鼓勵共黨之滲透顛覆活動，促成中

南半島各國淪入共黨魔掌。美國與毛共交往，加深毛共對大陸人民之殘暴統治，不啻鼓勵毛共此一對外侵略與國際冒險之邪惡力量，實有悖其自己所宣佈維持亞洲均衡及幫助自由民主國家協力抵抗侵略壓迫的宗旨」。我中華民國之兩次嚴正聲明，義正辭嚴，美國政府實有加以反省的必要。

十二月九日，我行政院長蔣經國復對隨同福特訪匪，奉派專程來華向我政府簡報福特訪匪經過之負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哈比指出：「中華民國反對美國與毛共偽政權交往，並且認爲祇有中華民國和美國的友好關係永久存在，才能實現福特總統所理想的亞洲真正的永久和平」。意義殊爲重大。

須知共匪之與美國勾搭，一再邀請美國總統前往大陸訪問，主要陰謀是在引誘美國承認其匪偽政權，並與共匪建交，以圖陷我中華民國在外交上處於孤立。然而，這只是共匪主觀而又可悲的奴性幻想，絕不足以動搖我堅毅之反共信念與政策。我中華民國自建國以來，一向本着獨立自主的精神，有原則，有立場，並確認國家的命運操在我們自己手中。我們自信可以克服任何橫逆，我們決不會因任何國際關係的變化，而動搖我們光復大陸拯救同胞的既定方針。共匪妄圖利用福特訪問來孤立我們的陰謀，在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屹立如山的反共決心前面，必然會被粉碎無遺。